

陈乐道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作者走访调查众多知情人写成的。敦煌卷子流散问题是敦煌研究以及历史档案文献流散研究的薄弱环节，《档案》杂志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篇文章，字数虽感略长，但很有价值，特别是对散存于民间历史档案的征集工作有启发意义。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卷子随即散出。目前，收藏于国内外公私机构的卷子数量，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已基本廓清。即以甘肃而言，由段文杰、施萍婷主编的《甘肃藏敦煌文献》统计，散藏于甘肃各地的敦煌卷子，其总数在国内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具体来说，敦煌研究院383件、敦煌市博物馆81件、甘肃省图书馆32件、甘肃省博物馆138件、西北师范大学19件、酒泉市博物馆18件、定西县博物馆10件、永登县博

物馆8件、高台县博物馆3件、甘肃中医学院3件、张掖市博物馆1件，共11家机构，所藏敦煌卷子约700件，总长约1400余米，是敦煌文献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还有部分辗转流散于个人之手的卷子，历经百年来的风雨沧桑和各种劫难，是否仍安然无恙地留存于天壤间？其数量到底若何？却是至今尚未揭开的一个历史迷团，令敦煌学者、尤其是研究敦煌卷子流散问题的专家为之深切关注和牵挂。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

江在《甘藏敦煌卷子知多少？》一文所言：“私藏卷子恐怕还有一些没有面世”，希望“能够发掘更多的散藏敦煌文献线索，为敦煌学界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载《档案》2000年第3期）。

为此，笔者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陆续走访、拜谒或电话请教多位知情人，试图为澄清这一问题略尽绵薄。期间，均得到他们热诚相助，并受到多年来一直留心敦煌卷子流散问题的《档案》杂志总编姜洪源先生、敦煌研究院专家冯志文

史料研究

档案

贰零柒年第壹期

先生的赞同，尤其是北大教授荣新江认为这个题目“很有价值。”若然，则我也就不枉此行了。

—

2006年8月的一天，我照例又到兰州雁滩古玩城浏览。当我踏进于洪高先生的店铺后，就坐下来和先生聊天，听他说些我所不晓的陈年往事。先生原籍临洮，年过古稀，几次和我谈起他的父亲于崇义，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天水师范校长，平素喜好字画，多有收集。他受父亲影响，也有此好，遂开了这间店铺，从这里常能看到一些陇上名人黄文中、杨思等人的书画。闲聊时，我特意向他询问是否亲眼见过敦煌卷子，他说“没有”，但思忖一下立刻又说，不过，听说过一桩有关敦煌卷子的事。他说，甘肃学院（兰州大学的前身）教师司秋运（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是我们临洮人”，收藏了几个敦煌卷子，后来流落到临夏，被兰州古旧书店买下，听说花了500元。关于敦煌卷子，他说就知道这些。不过，他的这个讲述，为我进一步了解却提供了线索。

我很快给潘琛先生通电话，同样几声寒暄后，我就转入正题，请教有关敦煌卷子的事。潘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今已76岁高龄，约在七八年前的一次书市买书当中和他邂逅相识。先生曾任甘肃省委党校教育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兼职教授，而今早就退隐在家。潘先生颇好读书，家中图书四壁，既有线装书，又有数十年来从天南海北收集的各种珍贵的文史书籍，充满浓浓的书香，令人欣羡。当我问到敦煌卷子时，他说“文革”前，兰州古旧书店时常能看到，价格也便宜，大概30元就能买到一卷。关于这方面情况，他



说，古旧书店的李彦章经理（也是古稀长者）知道得多，不妨一问，但李经理前段时间有病，不知身体近况怎样。他让我把电话先挂了，他马上就给我回，看李经理病好了没有。估计有半个小时，潘先生给我回话，说李经理愿意向我谈谈所知道的敦煌卷子的情况，并告知我联系电话。

随后，我给李经理通了话，说明了意图。从电话里可以感到，李经理口齿清晰，讲话富有条理。他向我详细谈了亲身经历的两桩收购流散敦煌卷子的事。

一是从武威购得卷子的事。他说，那是“文革”前，兰州古旧书店从武威偶然收购到《零金碎玉》册页，带函套。原来，它是在藏经洞大量卷子运走后，从洞窟墟土尘埃里将遗留的经卷残字用筛子披捡出来，装裱而成的一个册页，故名。书店收购回来之后，想卖给甘肃省博物馆，当时要价200元，但对方嫌贵，不要。最后，被北京中国书店买走。证诸相关记载，民国时曾任肃州道尹的钟彤沅在其1923

年赴任途中的日记《使肃纪程》里就说到，他所藏经卷中就有捡自藏经洞里的片纸断幅“排比成册”的卷子。

一是从临夏购得卷子的事。那是“文革”后期，兰州古旧书店恢复后刚开门不久，生意不太好，所以就派人下去到各地县收购古籍文物。李经理说，他和单位的一位领导到了临夏，以当地的书店为点，在街头张贴广告，招徕宣传，进行收购。广告贴出后，就有人络绎前来。其中就有人问“要不要敦煌卷子？”李经理一看，约五六卷，长短不一，东西不错，是真的，说“要”。但当时东西的价格比较低，卷子到底价值多少，买卖双双心中都无数。这中间就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持卷人忽然又不卖了，说要卖给北京。李经理他们就给做工作，说钱可商量。最终持卷人同意出卖，五六个卷子，共用千元以内的价格成交。这些卷子据说就是从甘肃学院教师司秋运家流散出的。卷子尽管拿到了手，但李经理他们有顾虑，担心当地行政部门干预。另外，李经理说当时他的领导对东西的真伪也有怀疑，怕是赝品。所以卷子拿到兰州后，没有回家，就径直去找书店的常体仁先生，先请他看。常先生1956年自北京调到兰州工作，擅长文物鉴定。看后，认为东西没问题，是真的。又请陆为公看。陆为公（1909—1989），甘肃庆阳人，曾任金塔县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科委副主任、政协甘肃省委第四届秘书长、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爱好收藏。当时，陆为公看后，也说没问题。再后来，李经理说忘了是哪一年，北京图书鉴定组来到兰州，也仔细看了，说没问题。另外，这些卷子在

史料研究

流传过程中可能按轻重计价，因为当时看到卷子上有“两”的标记。之后，都陆续处理掉了，卖给私人了，买得卷子的人，李经理说，其姓名也不便讲，现在手中是否仍珍藏，不得而知。

除此，李经理说，兰州古旧书店先后还收过其它唐人写经及别的时期的卷子。这些写经的纸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薄的，蜡黄颜色；一种是厚的，像今天的牛皮纸。收书过程中，曾看到兰州八里窑一位供职于教育界的人士，手头收藏有敦煌卷子，但不出售。

二

某一天，我又给路志霄先生通电话询问卷子的事。路先生退休前，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选教研室主任、古籍整理所副所长（其师彭铎为所长）、副教授，在地方古籍整理方面颇有建树，编纂出版过《陇右近代诗钞》并自己的诗文等多部书籍。毕竟年过八旬，去年我和先生通话，他还听得清楚，现在我在电话里讲，即使大声慢讲，他几乎听不大明白，只能由他老伴代接，总算看懂了我的意思。尽管重听，但先生对我所求之事，却不推辞，认真指教。当晚，即给我回话，说他想起了曾两次从私人手中见过敦煌卷子的事，并给我找到了相关资料。翌日（星期六），大约中午时分，我冒着热浪，手拎瓜果，步履匆匆，来到路先生住处。先生住在其老伴曾任教的兰州西北新村小学家属院，虽然只是一排简易的平房，房中冬天没有暖气，但眼下初秋，院里点缀着花草，相对闹市却透出几分幽静。先生将我引进屋里坐下，遂给我慢慢讲起他所亲眼目睹两次敦煌卷子的事。

路先生说，西北新村小学原来

有一位教师，名叫周孝，“文革”期间，改名周戈，他父亲好像曾是文史馆长（按，应为副馆长。即周定宣，原名廷元，字定轩。湖北咸宁人。同盟会会员，曾任甘肃都督府秘书、静宁县知事、代理安肃道尹兼嘉峪关监督等职，1953年被聘任为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1956年病逝。撰有《甘肃大地震记略》。据北大荣新江教授文章可知，周氏收藏敦煌写本127卷，并著《编目赘言》。国家图书馆有他捐赠的敦煌卷子。）上世纪70年代，周孝想将家里收藏的一件敦煌卷子（写经）出售，托路先生牵线说项，要卖给甘肃省博物馆，不知是何缘故，对方却不要。我问，卷子后来藏在哪儿？路先生说，前几年周孝去世，卷子就不知下落了。

紧接着，路先生给我谈了另一桩敦煌卷子的事。他说，有个名叫杨遇春的人手头有卷子，上世纪80年代，曾拿来请他题识，路先生谦虚，认为自己对此没有研究，当时就没有题，但他转请李鼎文先生题了，内容是三首诗。路先生说，

就拿出早已找好的《玉壶集》（199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翻开教我看。果然，里面收入李鼎文先生的这三首诗。（按，李鼎文（1919—），西北师范学院教授、甘肃省文史馆馆员，著有《甘肃文史丛稿》等，现移居新西兰。）我又问道，那杨遇春先生现在住在哪里？卷子还在吗？这让路先生一时感觉为难，因为他只是以前和老伴到过杨先生家，知道路难走，已和杨先生好久不联系了，而且杨先生年龄比他大，是1920年出生的人。路先生随即掏出电话本，翻找号码，说要试着问一下。当电话打过去之后，我从旁边听出对方声音洪亮，路先生问对方可是杨遇春先生吗？对方答应说是，互道问候后，路先生就问杨先生收藏的敦煌卷子还在不？说省档案馆的陈乐道同志想看一下，行不行？我听到对方很痛快地答应说“还在，可以看。”我立刻就给杨先生通话，问清了他的住处，说我马上来拜访。

确如路先生所言，杨先生家住在兰州城乡结合部的偏远一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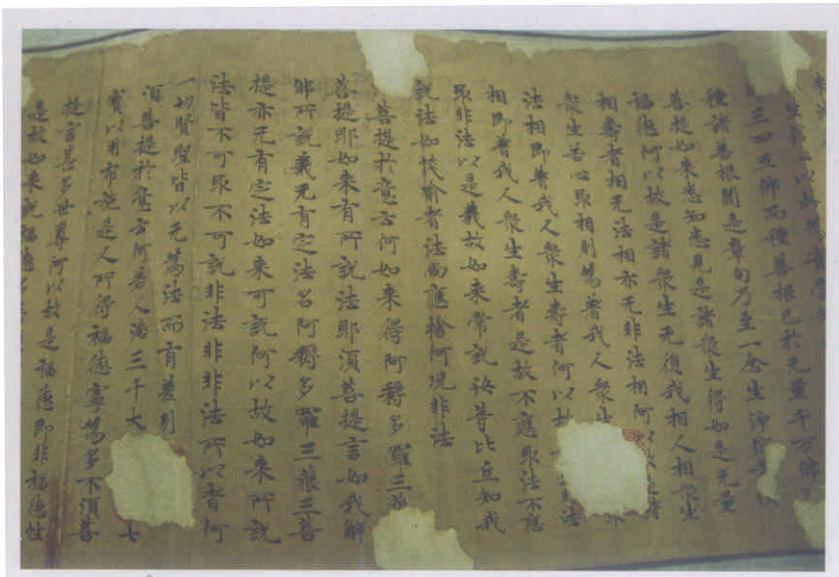
敦煌卷子收藏者杨遇春先生（左）和敦煌研究院冯志文先生



史料研究

档案

贰零零柒年第壹期



杨遇春先生收藏的敦煌卷子

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总算找到。一瞥之下，大门口石块围起的两丛绿竹，在秋阳的艳照下，煞是令人可爱。我暗想，这里的主人定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当我按下门铃后，杨先生笑盈盈地开门迎接。走上二层楼，进入他的卧室兼书室，只见书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床上堆着写好的书法作品，朴茂有力，原来先生是个造诣深厚的书法家。坐定之后细瞧，杨先生尽管头发白了，但面色红润，身板硬朗，且谈吐生动，根本看不出是个87岁高龄的老人。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眼下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有的定居国外。他和老伴正安度桑榆晚年，虽略感岑寂，每日染翰泼墨，临池观帖，也乐在其中。当一提到收藏敦煌卷子的事，他动情地说，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他时任甘肃省交通局营业所的会计，当时单位成立了收“破烂”小组，组织人员上街收购废铜烂铁等。杨先生喜欢碑帖书画，所以每天待收购人员回来后，他都要翻看收购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这些。

有一天，杨先生照例又去看，忽然有两个卷子，一长一短，映入他的眼帘，他当即就收藏了下来。最早从他手中看过卷子的有杨景周、冯国瑞、谢国泽等人，认为是敦煌写经残卷。杨景周，临洮人，毕业于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后来经商，从事水利工作，平时喜欢收藏文物。冯国瑞，天水人，著名学者，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泽，民国时期曾任甘肃《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于诗词。当时，冯国瑞先生看了卷子后，认为东西不错，还劝杨先生将小的卷子装个镜框挂起来。后来，一位姓刘的天津古董商也看过，打算收购。另外，杨先生说，兰州水北门住着一位姓赵的山东人，喜欢收藏古董，看了卷子后肯定地说，长的那卷应为《金刚经》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已刊登在《神州国光集》上。

这样，杨先生就将两个敦煌卷子一直保存下来，秘而不宣。尽管“文革”时他被关进“牛棚”，手中别的东西受了损失，但此两卷却

幸而躲过劫难。直到1985年，他将两个卷子付诸装池，亲自修裱后才拿出示人，请人题识。说罢卷子的来龙去脉，杨先生遂站起来，走到书案旁，将早已准备好的卷子缓缓展开，一个短的，一个长的，我的眼前顿感一亮。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卷子依然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杨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两个卷子，其中长的属《金刚经》残卷，长约160cm，宽约26cm，内容自右至左，竖排直书，画有界栏，从开首“佛告诸菩提……”至尾行“……是各世界须菩提”结束，共93行，每行17字。虽是残卷，但除了个别地方字迹剥落外，品相基本完好，墨色如新。如果加上诸家题识和收藏者杨先生的后记部分，整个卷子装裱起来长300cm有余。题识的依次有李鼎文、甄载明、张思温、张芸生和袁锐等。均为直行墨书，自右至左，用宣纸题写。

李鼎文先生的题识是三首诗（七绝）：“文物纷随渡海船，敦煌卷子散如烟。中华学术伤心史，留待今人理断篇。昔年曾到古沙洲，石室丹青照两眸。怅望西凉佳丽地，三危山上月如钩。杨公嗜古擅词章，手迹唐人善宝藏。老人自夸饶眼福，银钩铁画墨凝香。”落款：“癸酉季秋为杨遇春题唐代写经卷子 武威李鼎文”。钤有“鼎文”名章，阳刻，字体金文。

甄载明先生的题识是：“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卷子大部为外人盗去，但流散于我省者，在旧社会恒能见之。解放后，一因国家文物部门之大力搜求；二因文化大革命之浩劫，今则不复多觐矣。杨遇春兄顷携此卷属跋，使仆于暮年又得睹此，自幸眼福不小。予所见不多，

史料研究

但此卷确属上品。惟愿遇春兄加意呵护，使千年古物永放光芒，亦壹大功德也。”落款：“癸酉中秋节前十日 甄载明谨识。”钤有“甄”、“载明”两方印章，分别为阳刻、阴刻，字体小篆。按，甄载明（1912—2001），陇上著名书法家、诗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从其题跋来看，先生不止一次地见过敦煌卷子。虽然我有幸结识先生，但遗憾的是在他健在之时，未能就此讨教，怅何如之！

张思温先生的题识是：“敦煌石室所藏经卷流传于世者，今已不多。此虽残本，尚见唐人规矩。杨遇春君得之，甚为宝爱，其珍藏之！”落款：“公元一九九三年九月 河州张思温拜题 时年八一。”钤有“玉如”、“跋记”两方印章，字体小篆。按，张思温（1913—1996），著名西夏文学学者、诗人。曾任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及名誉馆长、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家曾将所藏敦煌汉文卷《瑜珈师地论卷第二十三》捐赠给甘肃省图书馆。

张芸生先生的题识是：“癸酉秋洛门张芸生观。”钤有“张芸生印”名章，字体小篆。

袁第锐先生的题识是一首诗（七绝）：“乍睹黄缣感慨深，珍藏模写两知音。须将残卷当完璧，中有幽香沁古今。”落款：“题杨遇春先生所藏唐写金刚经卷 袁第锐。”钤有“恬园涂鸦”闲章，字体小篆。按，袁第锐（1923—），著名诗人，曾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现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

最后是卷子收藏者杨遇春先生的后记：“此千年物也，有唐一代释教盛行，朝野信佛之风不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奘有天竺之行，

鉴贞（按：‘贞’应为‘真’）之扶桑东渡，尤为佛教史生辉增色。敦煌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要隘，仅从窟藏文物一鳞半爪中，亦可略窥盛唐时期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之景。当是时也，佛教影响至深且广，写献佛经，蔚为风尚，故无名书法家应时而生，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惜多不传其名尔。此即千佛洞唐写经也，乃劫后余生之物，系《金刚经》前半部残篇，所幸千载后纸墨如新，且书法隽秀，观其用笔之法，似与近人小有差异，虽出自无名氏之手，但其功力深厚，字迹遒劲，不失魏晋风范，较之历代名家法书，毫无逊色。清嘉道间，乡先辈唐介亭先生精于书画，左文襄对其作品极为欣赏，时人有‘精斯篆，工小楷’之评语，其小字尤为绝伦，盖实得于敦煌经也。友人曾言《神州国光集》廿四集前后印有此经，后半部余未之见也。余不敏，乃效古人，因并所藏夔龙砚、程君房墨，名吾斋曰‘经石墨缘堂’，故人叶寓尘曾为治印一方，聊以自娱耳。辛未长夏书此，以俟博雅君子之鉴赏也。”落款：“杨遇春 时年七十二。”钤有“杨”



“遇春”两方名章，分别为阴刻、阳刻，字体小篆。另外，卷子本身之上也钤有“兰山”、“杨遇春”的印章。

短的一个残卷，长约45cm，宽约26cm，内容也自右至左，竖排直书，画有界栏，自开首“色其以神通……”至尾行“无吾我其无”结束，共28行。

9月11日下午，秋光明媚。应杨遇春先生之托，要找一位专家再对卷子进行鉴定。我特地邀请并陪同敦煌研究院冯志文先生，又一次来到杨先生家。经过冯先生的仔细辨识，确认长的卷子是真的，属唐代写经，短的卷子还待考证。当谈到兴浓之际，杨先生又拿出他珍藏的数种碑帖，让我们欣赏，足饱眼福。

杨先生谈到，建国前，他从别人之手也见过敦煌卷子，但已破损严重，品相不好。另，他还听说，建国初原兰州一中校长张作谋先生，曾将自己藏的敦煌卷子卖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三

恰巧，我与张锲先生彼此相识，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其尊翁张作谋先生确曾将一个敦煌卷子卖给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时间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卷子原是他父亲的老师杨丙辰（曾在兰州中学任教，后来当了敦煌县长）建国前从敦煌带到兰州之后，亲手送给其父的。他父亲曾将卷子带到南京，让于右任先生鉴赏，当时有一政要想购买，遭到他父亲的拒绝。张锲先生说，他父亲平生嗜好收藏，积累颇富，其中就有郑板桥的竹子画。记得当年，兰州书画界的名人范振绪、水梓、冯国瑞、郭维屏、郝进贤等人常到他家，同其父一道观摩所藏书画珍品，包括敦煌卷子，作诗文之

史料研究

档案

贰零柒年第壹期

会。但这些珍贵书画不幸在“文革”抄家时，荡然无存。按，张作谋（1901—1977），字香冰，甘肃临洮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建国前，曾任兰州一中校长，武威专区专员。建国后，任省政府参议。著有《新蕉细雨轩诗集》《词集》。

张锬先生还说，敦煌卷子卖掉后，他父亲甚感惆怅，借诗抒怀。为此，我转请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传明从所藏张作谋先生《新蕉细雨轩诗集》抄得相关内容，其中卷四就是题为《鬻敦煌经卷有感并序》的诗。诗前序文这样写道：“东汉刘向《说苑·反质》篇，敦煌经卷中惟一之子部卷帙也，完整无缺，尤为难得。吾师杨丙辰权知敦煌县事时得之，视若拱璧，不轻示人。旋因事持来贻余，余以其廉，谢而弗受。嗣竟归余，终又归之初地，心中殊觉快快，于其去，题诗四绝以志感。”四首诗依次为：“四载瓜州忆四知，压装经卷慨相贻。因廉谢却偏归我，愧负初衷又负师。”“蚕纸乌丝麝墨香，士林钞写证初唐。篋中每觉多神异，不是藜光便佛光。”“金题玉躐附名山，祈福禳灾各等闲。终是赠遗能解困，愿将完璧返娘嬛。”诗后自注：“南京某权要于于右任处见而羨之，许以重金相让，余乃婉言而谢却。”

卷九还写有题为《张令瑄以范禹勤先生为其尊公鸿汀所绘〈敦煌考古图〉见示，为题数韵以归》的长诗，而此重要诗篇在介绍《敦煌考古图》的有关文章中却被漏掉，兹不妨一并抄录出来。诗云：“三危遥接三竺路，佛曾浴露山中住。千岩缒縹秘千秋，一朝破壁忽飞去。石室空留佛千尊，丹墙藻井俨祇园。游客纷纷观壁上，数典忘祖

难具论。吾宗昔纂《陇右志》，金石一编称赅备。广搜更欲访娘嬛，橐笔敦煌证载记。敦煌文物盛汉唐，奚翹琳宫独擅场。一代风云搜汗血，几家割据僭侯王。裴岑纪功存勒石，金乡又出武班刻。木简累累字分明，龙沙时见沉沙戟。鸢飞吴会未谖悠，龙跳天池说风流。梓人传与草书状，未知复壁还有不？阳关唱彻三叠曲，瀚海之东何衍沃。绕蒲龙勒互濛濛，平芜合当名效谷。归来碑板压征鞍，实录爬梳日掩关。华原赠绘寄深意，楼外峰峦坐卧看。千峰万壑踏无数，会心却在断碑处。证罢《山经》证《水经》，昆仑雪溅惊人句。嗣君示我《访古图》，山迹人迹叹黄垆。珍图更望珍铅槧，勿令遗编饱蠹鱼。”

四

8月24日，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俞正前来省档案馆视察。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省馆特藏展，我临时为他讲解。当他看到展柜里的敦煌卷子（复制品）时，我主动请问道，说俞主席您曾见过私人手头收藏的敦煌卷子没有？他马上说“见过”，而且说他家就藏有敦煌卷子（写经）。我很感惊奇，继续鼓勇追问，想一探究竟。从俞主席的讲述中我得知，此卷子是他父亲俞方皋得自顾子惠先生之手。按，俞方皋（1893—1981），著名爱国将领，陆军中将，1949年率部在绥远起义，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常委。顾子惠（1904—2005），陇上著名书法家。俞主席讲，卷子还先后请谢稚柳、启功两位先生题跋，现暂不在他手头，借给一位朋友欣赏去了。

不久，通过甘肃省档案局（馆）长刘玉生出面，与俞主席电话联系，承其慨允，我从他那里得

到了谢稚柳、启功二位先生的题跋（复印件）。谢稚柳先生的跋语是：“右《妙法莲华经》卷二十六，为唐人所书，盖敦煌石窟所出。敦煌经卷散落中外，此卷殊难得也。”落款：“庚午秋日 谢稚柳观 因题。”钤有“谢稚柳”名章，阴刻，并一枚鸟篆文印章。按，庚午当为1990年。启功先生的跋语是：“此敦煌所出唐写经卷，纸质略粗，故笔画斑驳，反复展观，弥见古趣。仆于唐人墨迹，夙有癖嗜，零笈碎叶，莫不拳拳宝玩。今见此卷，几无残缺，诚堪珍惜也。”落款：“一九九一年冬日启功。”钤有“启功私印”、“元伯”两方印章，分别为阴刻、阳刻，字体小篆。

9月9日下午，我在兰州隍庙海大宏老板经营的“存古斋”收藏馆，不期而遇年过八旬的常振勋先生，碰巧邓明先生也偶然来此。在鉴赏罢海老板拿出的潘龄皋等名人字画后，我随即请问常先生，是否见过私人收藏的敦煌卷子，常先生说，“文革”前见是见过，而且不止一件，但都记不大清楚了。不过，他仍向我们讲述了一位曾收藏过敦煌卷子（写经）的于鹤侣的身世，令人叹惋。于鹤侣，江西人，曾与现代著名作家丰子恺等过从相识。曾在兰州箭道巷租房居住，房中堆满了各种文物，常先生不仅在他那里见过敦煌卷子（写经），而且还有他和丰子恺之间的通信，以及各种书籍文物。一生未婚，为人不狂，凡事都不执着，知道的东西却很多。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冬天没有棉衣穿。先由常先生介绍，在图书发行公司里当临时工，干点诸如刻蜡版的活。后来，在兰州市卫生局当过临时工。1960年，因低血糖而死。死时约40岁左右。他江西

史料研究

老家的姐姐来到兰州，将他一屋子的书籍文物（包括敦煌卷子）处理掉了，落到何处不清楚。按，常振励（1926—），著名诗人，曾任《兰州晚报》副刊编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理事、甘肃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他曾收藏有明代陈老莲的画，现代丰子凯、张元济的书法对联等，在1957开始的几次抄家中均被散失。

之后，兰州市地方志编辑办副主任、地方史专家邓明先生向我也吐露了其外曾祖父收藏敦煌卷子的事。他的外曾祖父马文炜（1892—1949），清朝举人，曾任广东潮州、汕头盐大使。辛亥革命后，任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前身）国文教员，1923年任甘州镇守使马麟的幕僚长、署高台县行政长，转升为张掖县行政长，马仲英时期任高台县长。著有诗文集《感慨集》《潮汕随感录》和《甘泉随笔》。邓明先生听他舅舅讲，他外曾祖父收藏了好几个敦煌卷子，都一一散失。按，邓明先生曾在2002年第2期《档案》杂志发表《关于〈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的一点补充》一文。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杂志主编彭清深先生，通过姜洪源总编联系，向我也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特地前往拜访，彭先生说到，他的外祖父鲁铃，字培民，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建国前曾任敦煌县长，建国后任过张掖中学校长。曾在建国前兰州的某家报纸发表过有关敦煌的研究文章，并收藏有5个敦煌卷子，1957年抄家时被抄走。彭先生还说到，著名藏学家、西北民族学院教授王沂暖（1907—1989）先生抗战时曾在重庆得到两个敦煌卷子，现不明下落。

另，我向今已86岁高龄的著名

书法家、兰州医学院教授何裕老师也问过敦煌卷子的事，他说曾在顾老（子惠）家里见过其收藏的一个卷子，似六朝写经，不大，并说顾老的哥哥原在北京琉璃厂从事过书画装裱。有一天，何老师又提到一桩事，那是建国初在兰州城将没收的西北马家军阀的文物进行展出，其中他就看到有敦煌卷子赫然在焉。

我向甘肃省文史馆馆员、甘肃省博物馆文博专家秦明智先生也问过敦煌卷子的事。他说，许多事记不清了，记得曾从天津人手为省博物馆收购过卷子。还有，邓宝珊将军、冯国瑞先生，以及甘肃最早的女共产党员秦仪贞家均给省博物馆捐赠过收藏的敦煌卷子。按，据《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记

载，秦明智先生“为省博征集书画、碑帖、陶瓷、金石、敦煌遗书、佛像、印章等数千件。中有左宗棠、康有为、沈曾植、郑效胥、张大千等名人书画和大量地方名人书画，还收购到十多件敦煌经卷”。

最后要说的是，中秋节那天，我在逛兰州文化宫附近的古籍书店时，同书店旁一家“玉翠晶”眼镜铺的老板王发忠闲聊，也获知了有关敦煌卷子的点滴信息。因王老板平时喜欢且兼收文物字画，三年前一位来自青海的古董商拿着3个敦煌卷子（写经）来问他要不要？卷子质地为蓝色的绢，其中最长的达到2米以上，有撕裂的痕迹。不知确信否？附记于此。

